

# 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研究： 视角、内容、反思

沈 敏,姜礼立

**摘 要:**湘与黔桂边区域既是南北方言的过渡地带,也是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交叉地带,具有区域语言学的研究意义。该区域的方言语序研究尚显薄弱,可依据“一个中心、两个层面、三个视角、十六个观察点”的整体研究思路,从区域语言学、语言接触和比较语言学的视角对该区域汉语方言共时语序进行全面调查,建立“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数据库”,考察梳理已有记录的特殊语序在该区域的分布及扩散情况,发掘新的方言特殊语序现象,并对其认定、分析和解释。

**关键词:**湘与黔桂边;方言语序;区域语言学;语言接触;比较

**作者简介:**沈 敏,湖南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汉语国际推广研究院副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姜礼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博士后(北京 100081)

语言类型学已是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流派,甚至可以说是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而语序类型学则是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根据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成果,观照汉语普通话和方言的语序类型特征。但由于目前语序类型学理论并不完善,多家提出的语序类型参项大都是在比较有限的语种数量基础上得出的,互相之间并不完全吻合。因此在对汉语特别是南方方言语序类型的认识上仍存在分歧。例如,刘丹青(2001)依据话题化倾向性强弱等参项,认为吴、闽方言是最弱的 SVO 型语言,具有最明显的 SOV 倾向<sup>[1]</sup>。桥本万太郎(1985)<sup>[2]</sup>、张振兴(2003)<sup>[3]</sup>、石毓智(2004)<sup>[4]</sup>等却先后指出吴、闽等南方方言与北方官话相比,更符合 SVO 型语序特征。姚玉梅(2014)通过考察自移事件和致移事件中趋向动词、趋向补语和宾语(包括受事宾语和处所宾语)的语序后得出闽语是强 VO 方言,而吴语则是弱 VO 方言<sup>[5]</sup>。而邓思颖(2006)则以生成语法的动词位移为参数,发现以新化话为代表的湘语才是汉语方言中“最强的 SVO 语言”,并进一步指出各方言 SVO 的强弱性可构成以下序列:湘语>粤语>普通话、北部吴语>南部吴语、闽语<sup>[6]</sup>。所以,要想厘清汉语尤其是南方方言语序类型的特征,则还需要结合类型学已有成果,对各具体方言的基本语序类型参项进行调查、描写研究,并借以建立相关跨方言、跨语言的不同参项的语序类型数据库。在此基础上,通过跨方言跨语言的比较,归纳、推理出该区域语言(方言)语序类型特征及和谐性。本文以湘与黔桂边区域为例,提倡跨方言跨语言的语序类型学研究,拟从整体思路、研究视角、重要内容等方面对该区域的方言语序研究提出若干思考。

## 一、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研究现状

湘与黔桂边地区既是南北方言的过渡地带,也是一个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交叉地带。这一地带有湘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平话等方言,还世居有苗、瑶、侗、土家、壮等少数民族。民族语言与方言之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湘与黔桂边跨方言跨语言句法语义比较研究”(15ZDB105);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CSL 学习者易混淆副词及其诊疗性辨析研究”(13YBA242)

方言与方言之间接触都十分频繁,因此必然产生不少特殊的语言现象、语法现象。但是,长期以来该区域基于语言接触视角的语法研究仅有零星描述,尚未系统展开,目前能看到的研究成果非常有限,语序类型方面的研究更是少见。

湘黔边区域方面,李启群(2004)对湘西州汉语方言中宾语位于谓语动词前和谓语在主语前这两种特殊语序进行了考察<sup>[7]</sup>。肖亚丽、关玲(2009)揭示了黔东南汉语方言几种特殊的语序,如修饰语后置、主语后置、直接宾语后置、动结式结构中宾语前置于补语、助词“过”后置、比较结果前置等,也认为这些特殊语序是受到了当地民族语言的影响<sup>[8]</sup>。李启群、鲁美艳(2011)考察了湖南龙山他砂汉语方言的特殊语序,如宾语前置于动词或介词前、数量短语或形容词作定语位于中心语之后、副词“在”置于谓语之后、差比句中被比项置于比项之前,文章认为这些特殊语序是受土家语影响而产生的变异现象<sup>[9]</sup>。胡萍(2016)记录了湘西南苗瑶平话远指代词的三种基本类型,文章认为“(近指词/远指词)+量词+中心词+远指词”这一类型与汉语语序有差异,是苗瑶语底层的反映<sup>[10]</sup>。

湘桂边区域方面,既存在湘语与桂北平话、西南官话等方言的接触,也有湘语与壮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李蓝(2004)记录了城步青衣苗人话这种系属不明的汉语方言中的几种特殊语序现象,如极个别副词后置于极个别动词之后<sup>[11]</sup>。另外,绥宁方言中也有范围副词“净、光”可后置于动词“吃”的特殊语序。这种语序既受动词限制,又受副词限制。诸如此类的特殊语序当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不无关系。孙叶林(2005)描写了邵阳方言双宾句的两种语序类型,文章认为双宾句的语序类型与动词的语义特点密切相关<sup>[12]</sup>。李康澄(2011)描写了湖南绥宁汉语方言中指示词后置于名词的语序类型<sup>[13]</sup>,这种语序类型主要分布在绥宁与通道交界地带,并且该语序类型在汉语其他方言中还未见提及。罗昕如、刘宗艳(2013)通过考察桂北湘语“得”字结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差比句、趋向动词作可能补语等语序,认为其既保留了湖南湘语的一些固有特征,又在与西南官话接触中具有了桂林官话的某些特征<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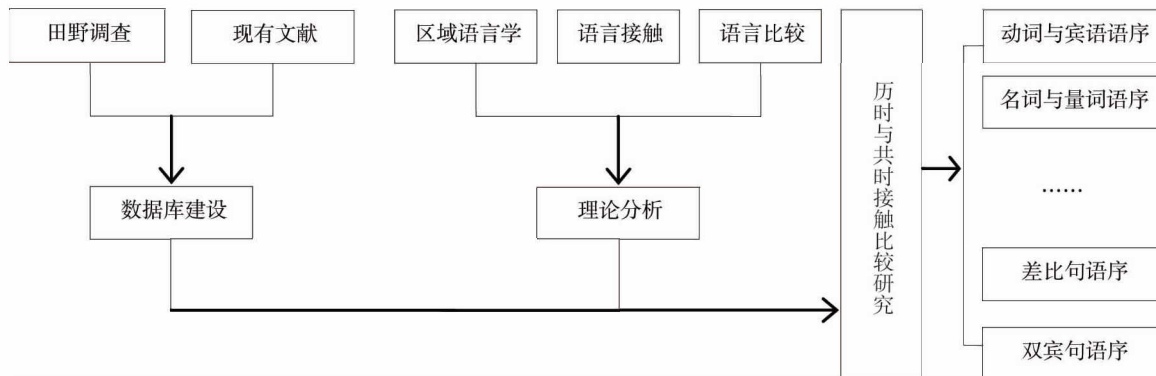
综合来看,汉语方言语序研究有新进展和新发现,但整体比较薄弱,研究成果偏少,而湘与黔桂边区域的方言语序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未见从区域语言学视角对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进行跨方言、跨语言比较的系列研究或系统研究。现有方言语序研究涉及的参项不少,如主动宾语序、修饰语语序、差比句语序、能性述补结构与宾语的语序等,但语言调查点偏少,语序材料发掘不够,研究视野不宽。特别应该指出的是,现有研究较少从语言接触视角,关注南方多族群、多语言、多方言地区的语序,较少关注不同地区边界地带的方言语序,而恰恰是在这些地方,汉语语序特征会表现得更丰富、更独特。在区域语言学视野下,探明湘与黔桂边地区这一语言“富矿”地带的方言语序情况,用语言接触理论和语序类型学理论来探讨这些语序的形成机制具有十分积极的学术意义。

## 二、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研究整体思路和视角

### (一) 整体思路

我们主张对湘与黔桂边区域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进行系统调查与深入挖掘,可为语序类型学研究提供更多来自汉语南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事实,能够进一步丰富并发展语序类型及语言接触理论,也有助于保护民族地区及多方言、多语言交叉地区独特的语言资源,传承地方语言文化,增强地域文化活力。研究的总体思路可概述如下:参考基于大规模语种库确立的语序类型与形态语义数据参项,综合考察汉语南方方言(以湘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平话等为主)和苗瑶语族、壮侗语族、藏缅语族已有语序研究的材料,结合初步的语言调查及研究者的观察与自省,确定一个适合湘与黔桂边区域汉语方言的语序参项调查表;在湘黔、湘桂边境方言与方言、民族语言与方言接触频繁地区设立若干调查点,依据语序参项调查表进行语序调查,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记录、转写,初步建立“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数据库”;在语序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跨方言、跨语言的语序比较研究,梳理方言和方言、民族语言和方言在语序方面的相互影响,同时提取方言中的特殊语序现象;从语言接触、语言比较以及区域语言学视角来分析、解释该区域汉语方言特殊语序的性质、来源、形成过程和机制,并归纳湘与黔桂边区域各方言的语序类型,寻找并确立该区域的方言语序共性。以上研究思路可简要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层面、三个视角、十六个观察点”。

即围绕“语序”这一研究中心,进行历时、共时两个层面的探讨,从区域语言学、语言接触和比较语言学视角对湘与黔桂边区域汉语方言的短语语序和句式语序两大类共计 16 个语序参项进行调查和立体比较研究<sup>①</sup>。整体研究思路可图示为:



## (二) 研究视角

湘与黔桂边区域是一个多族群、多方言、多语言的复杂地带。这一地带带有湘语、西南官话、湘南土话、平话、客家话等方言,还有苗、瑶、壮、侗、土家等少数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与方言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接触都十分频繁,因此必然产生不少特殊的语序类型现象。而这些特殊的语序现象只有从跨语言(方言)比较的视角,才能够被发掘出来;它们的性质、来源、形成的机制也只有从语言接触的视角,才能够解释清楚;该区域语言(方言)语序类型共性与特征,也只有从区域语言学的视角才能够提炼、概括出来。

### 1. 区域语言学视角

区域语言学(Areal linguistics)以语言区域(Linguistic area)为研究对象,关注的是特定地理区域内若干语言或方言在结构上呈现的相似性以及共享特征的跨语言(方言)扩散。湘与黔桂边区域语言状况复杂,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接触频繁,相互影响深刻。该语言区域由多种汉语方言(湘语、西南官话、平话、湘南土话、乡话、粤语、赣语、客家话等)和民族语言(苗语、壮语、瑶语、土家语、侗语等)构成,分属于汉藏语系的汉语、藏缅语、苗瑶语、侗台语 4 个语族。这些语言或方言因长期混杂分布,在语言接触方面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如湘西州分布着苗语、土家语和西南官话,怀化市分布着侗语、苗语和西南官话等。也正因为该区域内各语言(方言)之间长期的密切接触,形成了不少较为典型的区域共享特征。语序作为区域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在湘与黔桂边区域形成了哪些语序类型共性?这些语序共性特征的形成机制是什么?是源于共同的原始祖语,还是语言演变的普遍原则?抑或是平行的演变或沿流,又或者是纯粹的偶然巧合,还是语言接触导致的借用或扩散现象?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区域语言学视角,对该语言区域内的方言和民族语言语序类型进行详细描写和综合比较,方可找到答案。

例如,在湘西南绥宁的东山、朝仪、鹅公等地方言存在一种指示词后置的特殊语序,即指示词与处所词、量词、数量短语等名词性成分组合时总是处于这些成分之后<sup>[13]</sup>。如:

- 1) pie<sup>35</sup> tɕa<sup>35</sup> 那里      ha<sup>11</sup> tse<sup>13</sup> tɕi<sup>45</sup> 这会儿  
里 那                      下 子 这
- 2) ka<sup>35</sup> tɕi<sup>45</sup> 这个      ka<sup>35</sup> ŋin<sup>32</sup> tɕa<sup>35</sup> 那个人  
个 这                      人 那

名词性结构中指示词后置的现象除了分布在上述汉语方言中,该区域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如苗语、侗语、壮语也有分布,且是较为常见的语序类型。如:

- 3) 苗语: q<sup>h</sup>u<sup>44</sup> a<sup>44</sup> 那里      a<sup>33</sup> le<sup>35</sup> nən<sup>44</sup> 这个  
处 那                      一 个 这
- 4) 侗语: ki<sup>1</sup> na<sup>1</sup> i<sup>6</sup> 这里      tu<sup>2</sup> tɕa<sup>5</sup> 那只  
里 这                      只 那
- 5) 壮语: ki<sup>2</sup> han<sup>4</sup> 那里      dak<sup>7</sup> nei<sup>4</sup> 这块

里那 块这 (李康澄 2011:442)

这一特殊语序类型在其他汉语方言中极为罕见,其他方言多是指示词前置语序,所以其产生不会是语言演变的普遍原则,也不是平行的演变或沿流。如果只是纯粹的偶然巧合,那么该区域内的其他民族语言,如苗语、侗语、壮语指示词后置现象也不至于如此普遍。因此,这一特殊语序现象的产生很有可能是湘语与该区域内苗语、侗语、壮语等长期接触而导致的指示词语序借用或扩散现象。

## 2.语言接触的视角

周磊(2007)曾指出,“语言接触在近年来的研究中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人们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主要只是关注亲属语言里不同语言之间的接触现象,而一个语言内部方言土语之间的接触则未能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sup>[15]</sup>。汉语的方言和方言之间往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特别是在方言和方言的边界地区,方言和方言的叠加地区。而方言和少数民族混杂的地区更是如此。我们必须通过深入研究汉语方言和方言之间的接触,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接触,才能更进一步搞清汉语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规律。

研究湘与黔桂边的汉语方言语序必须重视语言接触。即从语言接触的视角,分析语序之间的互动和影响,分析解释特殊语序现象的性质、来源和形成机制。湘与黔桂边地区方言、次方言、土语种类繁多,民族语言分布广泛,语言接触频繁。湘黔边区域分布着湘语辰溆、娄邵、永全三个片区,它们从北至南与西南官话的黔北、岑江片广泛接触,相互影响,而这一带还分布着苗、瑶、壮、侗、土家等民族语言,民族语言与方言之间互动频繁,语序之间也相互影响。湘桂边境的湘语、湘南土话则与西南官话、平话发生接触,另有苗、瑶、壮、侗等少数民族语言。在这样的多方言、多语言混杂、叠加地带,没有语言接触的理论 and 视角不能解释相关语序现象。

我们通过调查发现,湘与黔桂边区域的一些语序现象存在明显的区域层次性。这些语序现象的区域层次性产生的机制是什么呢?例如,语言学界非常关注的性别形容词和名词组合的语序,有两种可能的情形,即“名+形”和“形+名”语序,如“鸡公”“公鸡”。这两种语序在该区域具有明显的层次性:

(1)汉语方言层:优势语序为“名+形”,如湖南怀化、吉首、隆回、邵阳、永州,贵州凯里、铜仁,广西柳州;少数地区为“形+名”语序,如贵阳、都匀、桂林。

(2)壮侗语族层:优势语序为“名+形”,如武鸣壮语、布依语、德宏傣语、水语、毛难语、黎语,但是侗语有两种形式。该地区的藏缅语优势语序同样为“名+形”,如贵州彝语。

(3)苗瑶语族层:优势语序不明显,有“名+形”和“形+名”两种语序。其中苗语点多为“形+名”,比如养蒿苗语、腊乙坪苗语、大南山苗语;瑶语点多为“名+形”,比如勉语、布努语、拉伽语;畲语两种语序都有。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名+形”语序在该区域汉语方言和壮侗语族中为优势语序,而苗语的语序多为“形+名”,瑶语的语序多为“名+形”,这说明苗瑶语的两种语序,特别是苗语的语序应该是受周边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影响,由语言接触所致。

## 3.语言比较的视角

句法语义的比较可以从多个角度展开,语序比较是其中重要的参考项。比较既可见差异,也可见共性。湘与黔桂边区域已有语序研究的相关成果多以汉语普通话语法为参照框架,缺乏建立在跨语言比较基础上的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框架,不具有通用性和可比性。研究该区域的汉语方言语序,一定要从跨方言、跨语言比较的视角,归纳语序类型,提取特殊语序现象。从已有研究资料 and 我们的观察来看,湘语中存在着的一些特殊语序现象,如状语后置、定语后置、指示词后置、宾语前置于补语等,目前均未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些语序现象只有置于与周边汉语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语序比较视野中,才能明了其分布特点,推测其可能来源。

从时间维度看,比较可包含两个层面:共时层面的比较,主要是对方言和普通话、方言和方言、方言和民族语言进行比较;历时层面的比较,主要是涉及语序演变过程或特殊语序的形成过程将需要对语序进行历时比较。从比较的角度看,一方面要突出跨方言、跨语言,另一方面要突出方言、语言之间的互相接触。具体比较角度则包括该区域方言与共同语的语序类型比较、各方言点与典型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方言与民族语言的语序类型比较、区域内方言与区域外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等。

例如,体标记“过”在普通话和黔东南方言中都是经历体标记,但是二者在句法结构中的语序类型却

有所不同。当动词后带宾语时,普通话的“过”要放在动词和宾语之间,即“V 过 O”;而黔东南方言的“过”却可以放在宾语之后,或者同时分别放在宾语的前后,即“VO 过”“V 过 O 过”<sup>[8]</sup>。如:

- 6) 他去过北京。(普通话)  
7) 他去北京过。(黔东南方言)  
8) 他去过北京过。(黔东南方言)

而据我们考察,体标记“过”的这种用法在黔东南州侗语中非常普遍,黔东南侗语体标记“ta33<sub>过</sub>”加在动词后面表示经历体时,如果动词带有宾语时,“ta33<sub>过</sub>”既可以放在宾语之前或之后,也可以同时放在宾语的前后。如:

- 9) jau<sup>212</sup> pai<sup>33</sup> pe<sup>212</sup> tɕn<sup>55</sup> ta<sup>33</sup>. 我去过北京。  
我 去 北 京 过  
10) jau<sup>212</sup> pai<sup>33</sup> ta<sup>33</sup> pe<sup>212</sup> tɕən<sup>55</sup>. 我去过北京。  
我 去 过 北 京  
11) jau<sup>212</sup> pai<sup>33</sup> ta<sup>33</sup> pe<sup>212</sup> tɕən<sup>55</sup> ta<sup>33</sup>. 我去过北京。  
我 去 过 北 京 过(肖亚丽,关玲 2009:177)

一般来说,如果两种语言具有某个相同或相似的语法范畴,那么这种相似性的产生可能源于以下几种动因:(a) 语言演变的普遍原则;(b) 发生学关系;(c) 平行的演变或沿流;(d) 语言接触导致的借用或扩散;(e) 纯粹的偶然巧合<sup>[16]</sup>。黔东南汉语方言属于北方方言西南官话,经历体标记“过”的语序理应与普通话的语序相一致,但却出现与侗语经历体标记“ta33<sub>过</sub>”相一致的特殊语序类型。究竟上述语序现象是哪种原因所致,则需将这一语序现象同周边汉语方言或民族语言的语序进行比较方可推测。首先,目前学界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汉语(方言)和侗台语族之间具有发生学关系,所以这一特殊语序现象的产生也就无法用发生学关系来解释。其次,这一语序现象虽说在汉语方言中较为罕见,但在侗语、壮语中依然存在,因此很难归因于纯粹的偶然巧合。另外,原因(b)和(c)一般用于解释跨语言跨方言的普遍现象,且两种语言之间一般具有发生学关系。而黔东南方言经历体标记“过”的语序类型罕见于其他汉语方言,所以也不大可能是语言演变的普遍原则或平行演变作用的产物。因此我们推测这一特殊语序现象是与侗语接触而来。证据有二:(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自古以来就是苗族、侗族等民族的聚居地,明洪武年间汉族移民以卫所屯兵方式成批迁入<sup>[17]</sup>。随后各民族之间交往频繁,语言之间相互影响深刻。(2)假定A、B两种语言共享的语法范畴F是语法复制的产物,若跟语言A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都没有F,而跟语言B具有发生学关系的语言则具有F,那么F的迁移方向应是“语言B>语言A”<sup>[18]</sup>。根据李蓝(2009)的对西南官话的分区,黔东南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湖广片黔东南小片<sup>[19]</sup>。我们在与黔东南方言有亲属关系的鄂北小片、鄂西小片、鄂中小片、湘北小片、湘西小片、怀玉小片等方言中均未发现“VO 过”这一语序类型。而在与黔东南侗语具有亲属关系的壮语中却有“V 过 O”语序类型<sup>[20]</sup>。如:

- 12) te<sup>33</sup> poi<sup>33</sup> kwa<sup>35</sup> pu<sup>31</sup> ki:ŋ<sup>33</sup>.  
他 去 过 北 京  
13) te<sup>33</sup> poi<sup>33</sup> pu<sup>31</sup> ki:ŋ<sup>33</sup> kwa<sup>35</sup>.  
他 去 北 京 过  
14) te<sup>33</sup> pi<sup>33</sup> kwa<sup>35</sup> ku<sup>33</sup> no<sup>13</sup> nou<sup>233</sup> kwa<sup>35</sup>.  
他 年 过 吃 肉 老鼠 过(梁敏 2010:48-51)

通过跨方言跨语言比较,我们可以推测黔东南方言经历体标记“过”的特殊语序类型是与侗语接触而来,且迁移的方向应该是“黔东南侗语>黔东南方言”。

### 三、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研究若干重要内容

(一) 根据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及民族语言的特点确定语序参项,全面调查该地区的共时语序情况

在语序类型研究中,因为研究目的和对象不同,对参项的选择也会有所不同。但参项的确立对某一区域语言(方言)的语序类型学共性与特征的挖掘与探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提取湘与黔桂边汉

语方言语序类型参项时坚持两个“结合”的原则:第一,短语参项与句式参项相结合。第二,普遍参项与特殊参项相结合。所设参项一般是语序类型学上的普遍参项,但也兼顾中国南方民族语言(方言)和湘与黔桂边区域汉语方言的特性。上述原则体现了参项选择的层次性,有助于挖掘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的共性与个性,使我们对该区域的语序类型能有更全面、深入的认识。

基于此,我们首先以 Dryer 提出的语序参项为基础,他基于 855 种语言的语种库,给出了 31 种详细描写语序类型和形态语义的数据参项<sup>[21]</sup>。然后参照李云兵(2008)研究中国南方 98 种少数民族语言确定的 24 个语序参项<sup>[22]</sup>,再根据本区域语言(方言)现有的资料和我们的前期调查成果,结合各方言的语序特点,初步确定以下 16 个语序参项作为调查重点:动词与宾语的语序、动词与状语的语序、动词后补语与宾语的语序、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的语序、形容词与否定词的语序、名词与领属定语的语序、名词与属性名词定语的语序、名词与形容词定语的语序、名词与量词的语序、名词与指量结构的语序、亲属称谓名词与代词的语序、名词与关系从句的语序、前置词/后置词的语序、同位结构的语序、差比句的语序、双宾句的语序。上述 16 个语序参项分属短语和句式两大语序类型:短语语序包括动词性短语语序(动词与宾语的语序、动词与状语的语序、动词后补语与宾语的语序),形容词性短语语序(形容词与程度副词的语序、形容词与否定词的语序),名词性短语语序(名词与领属定语的语序、名词与属性名词定语的语序、名词与形容词定语的语序、名词与量词的语序、名词与指量结构的语序、亲属称谓名词与代词的语序、名词与关系从句的语序),介词性短语语序(前置词/后置词的语序)和同位结构语序五类;句式语序包括差比句语序和双宾句语序两类。其中,动词性短语语序、形容词性短语语序、前置词/后置词语序和同位结构语序属于基本语序类型,要弄清该区域方言的语序类型须先对这些基本语序参项进行调查。而名词性短语的部分语序类型在湘与黔桂边区域显示出较强的特色,比如该区域部分语言属性名词定语后置、湘西南绥宁部分方言“指量名”结构中指示词后置等,都很有特点,将其作为调查参项,有助于我们梳理该区域汉语方言语序的共相与殊相。

根据以上参项集中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接触地区进行语序调查,并对调查材料进行整理、记录、描写,可初步建立“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语序数据库”。另外,在对上述语序参项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若有与该参项相关的其他语序问题,也应进行调查。例如在调查动词与宾语的语序类型时,就需要特别关注受事话题句语序在湘与黔桂边地区的分布情况,如此有助于我们考察该区域各方言 SVO 性的强弱。

## (二) 考察湘语研究中已有记录的特殊语序现象在湘与黔桂边区域的分布及扩散情况

根据已有的湘语语序研究材料,湘语中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语序。如能性述补结构带宾语时宾语常居于补语前,肯定式一般是“V 得 OC”(打得他赢),否定式则有“VO 不 C”(打他不赢)和“V 不 OC”(打不他赢)两种形式,且前者比后者使用频率更高,适用范围更广。这种语序在湘黔、湘桂边境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分布情况如何?

又如,湘语益阳话中的几种特殊语序<sup>[23]</sup>:

15) 晒得墨黑(的)一个。 一个个都晒得很黑。

16) 你走头,我走后。 你先走,我后走。

17) 他吃咖一餐饱的。 他饱饱地吃了一顿。

这些特殊语序在湘与黔桂边区域分布如何?具体涉及到哪些句式和词类?其性质和来源该怎样界定分析?

再如,前文提及的指示词后置于名词的现象,这一特殊语序在湘黔、湘桂其他方言区分布情况如何?来源该怎样分析?如果确定来自于周边少数民族语言,那么该如何通过语言接触理论来解释?已有报告的湘语特殊语序现象在十种左右,但只有简单描写,没有跨方言、跨区域的分布调查、比较研究,也鲜有基于语言接触或历时演变的来源说明。这都是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重要问题。

## (三) 发掘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的特殊语序,记录民族语言的语序演变

在语序数据库的基础上进行跨方言、跨语言的语序比较研究,从而总结归纳该地区方言及民族语言的基本语序类型,并发掘方言中新的特殊语序,记录少数民族语言因受汉语影响而产生的语序演变。湘与黔桂边地区方言与民族语言之间因为接触而相互影响,整体而言,汉语作为强势语言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影响

比少数民族语言对汉语方言的影响更大。因此,除汉语方言中的特殊语序之外,民族语言的语序演变也是应该关注的内容。比如,苗瑶语的基本语序类型是SVO,根据语序类型学的隐含共性原则,苗瑶语名词和定语的语序类型为:名词中心语在前,领属定语在后;名词中心语在前,属性名词定语在后。由于语言接触,苗语受到汉语影响,领属定语已经前置,且没有中介状态。与此不平衡的是,苗语的属性名词定语未受汉语语序影响,仍然后置,如“猪肉”在苗语中仍是“肉猪”。同为苗瑶语族的勉语却因为汉语语序的影响,属性名词定语也前置于中心名词,与汉语完全一样。民族语言中这样的语序演变现象不少,但不同地区不同语言,有快有慢,很不平衡,需要全面调查描写,也需要从语言接触、社会文化的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

#### (四) 湘与黔桂边汉语方言中特殊语序现象认定、解释和反思

##### 1. 特殊语序现象的认定

长期以来,对方言语序类型的研究主要关注特殊语序现象,而认定其“特殊”只看是否异于普通话语序。比如,“牛公、牛婆”异于普通话的“公牛、母牛”就被认定为形容词后置于名词的特殊语序。这样的认定实际上过于简单。“牛公、牛婆”等在湖南部分方言中还有带“子”尾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显然不宜分析成形容词后置于名词。如:

18) 牛公子公牛 牛婆子母牛

19) 鸭公子公鸭 鸭婆子母鸭

“公子”“婆子”本身就是名词,可以单独使用说成“一只公子、一只婆子”(一只公的、一只母的),所以上述结构在湖南方言里是很正常的“定语+修饰语”的语序,而不是“反常词序”或“特殊语序”。丁邦新(2000)分析湘语、客家话、闽语等方言中的所谓“反常词序”与我们持同样的观点<sup>[24]</sup>。张振兴(2003)也认为闽语中“牛公”“牛母”里的“公”“母”大概也是名词,不是形容词<sup>[3]</sup>。

再比如,“吃净菜光吃菜”中的“净”有人看成状语后置的特殊语序。实际上,湘语已有“一碗净菜”的说法,“吃净菜”应重新分析为“吃+净菜”的动宾结构。认定语序现象是否“特殊”不仅要看其是否与普通话有异,还应该以动态的、全面的眼光观察方言的语言事实。

##### 2. 特殊语序现象的解释与反思

目前,对方言特殊语序现象主要是描写,较少解释。部分研究试图从语言接触角度进行解释,但流于简单,失于宽泛。比如,黔东南汉语方言有“我大你三个月”一类的说法,有人把它看作“形容词+比较基准”的特殊语序,并解释为受到苗语、侗语的影响而产生<sup>[8]</sup>。这就很难让人信服。首先,普通话也有“我长你一岁”的说法,很多不与少数民族语言接触的方言也有类似说法,不惟黔东南有该现象。其次,古汉语差比句也是“形容词+比较基准”的语序,不排除古汉语语序的遗留。再比如,黔东南的双宾语语序以“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为常,就有人认为这是受到了侗语的影响,因为侗语也是如此。殊不知,这种语序在方言中分布很广,南京话、吴语、湘语等都有,几乎是南方方言的共性,“侗语影响说”就很牵强了。我们在解释汉语方言中的特殊语序或语法现象的来源时,应该警惕这样一种方式:某个所谓特殊现象只要民族语言有,就归因于民族语言的影响。这样可能会导致过分夸大民族语言在接触过程中对汉语方言的影响。根据潘悟云(2004)的推测,汉语南方方言很可能是在南方土著学习北方移民汉语形成的混合语的基础上形成的,所以南方汉语方言至今保留了一些底层土著语言的语序特征<sup>[25]</sup>。这样一来,一些特殊语序现象就很可能是原本就有的,而不是后来接触形成的。

注释:

① 参项确立原则及具体参项条目后文中有详细阐述。

参考文献:

- [1] 刘丹青.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比较[M]//史有为.从语义信息到类型比较.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222-244.
- [2] 桥本万太郎.语言地理类型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50-55.
- [3] 张振兴.现代汉语方言语序问题的考察[J].方言,2003(2):108-126.
- [4] 石毓智.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野[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56.

- [5] 姚玉梅. 汉语方言的语序类型: 再探闽语的分区[J]. 语言暨语言学, 2014(4): 539-573.
- [6] 邓思颖. 汉语方言受事话题句类型的参数分析[J]. 语言科学, 2006(6): 3-11.
- [7] 李启群. 湘西州汉语方言两种特殊语序[J]. 方言, 2004(3): 284-288.
- [8] 肖亚丽, 关玲. 少数民族语言对黔东南汉语方言语序的影响[J]. 贵州民族研究, 2009(5): 174-179.
- [9] 李启群, 鲁美艳. 湖南龙山他砂汉语的特殊语序[J]. 语文研究, 2011(1): 63-64.
- [10] 胡萍. 湘西南苗瑶平话远指代词的特殊语序[J]. 中国方言学报, 2016(6): 15-27.
- [11] 李蓝. 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225-226.
- [12] 孙叶林. 邵阳方言双宾句的动词与双宾语序[J]. 船山学刊, 2005(4): 49-51.
- [13] 李康澄. 绥宁汉语方言的指示词后置语序类型[J]. 中国语文, 2011(5): 441-442.
- [14] 罗昕如, 刘宗艳. 方言接触中的语序个案考察——以桂北湘语为例[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3): 81-86.
- [15] 周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中原官话(稿)[J]. 方言, 2007(2): 163-167.
- [16] 吴福祥. 南方语言正反问句的来源[J]. 民族语文, 2008(1): 3-18.
- [17] 金美. 黔东南苗语侗语对汉语语音的影响[J]. 贵州民族研究, 1998(1): 95.
- [18] 吴福祥. 关于接触引发的演变[J]. 民族语文, 2007(2): 3-23.
- [19] 李蓝. 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 方言, 2009(1): 72-87.
- [20] 梁敢. 壮语体貌范畴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48-51.
- [21] Dryer Matthew. S. Word Order in Sino-Tibetan Languages from a Typological an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C]. In Thurgood G. & LaPolla R.J.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03: 43-55.
- [22] 李云兵. 中国南方民族语言语序类型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27-28.
- [23] 崔振华. 益阳方言研究[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75-280.
- [24] 丁邦新. 论汉语方言中“中心语-修饰语”的反常词序问题[J]. 方言, 2000(3): 194-197.
- [25] 潘悟云. 语言接触与汉语南方方言的形成[M]// 邹嘉彦, 游汝杰. 语言接触论集.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298-318.

## Research of the Dialectal Word Order of The Hunan-Guizhou-Guangxi Border Region: Perspective, Content and Reflection

SHEN Min, JIANG Lili

**Abstract:** The Hunan-Guizhou-Guangxi border region, which is the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ialects and the cross area of Chinese dialects and minority languages, is worth investigating for regional linguistics.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the dialectal word order of this area is insufficient yet.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research idea of “One center, Two levels, Three perspectives and Sixteen viewpoints”, investigations of synchronically word order of this area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linguistics, contact linguistics, and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thus creating the Data Base of Chinese Dialects Word Order in Hunan-Guizhou-Guangxi Border Region. This research will not only investigate and collate the situation of distribution and pervasion of the known particular word order of this area, but also explore new particular word orders of dialects and make definition, analysis, and explanation.

**Key words:** The Hunan-Guizhou-Guangxi border region; dialectal word order; regional linguistics; linguistic contact; comparison

(责任编辑: 文建)